

傅逸尘

英雄传奇的“现代性”重构

——徐贵祥长篇小说新作《英雄山》读记

徐贵祥是极擅长讲故事的作家。从1990年代的中篇小说《弹道无痕》《潇洒行军》《决战》，长篇小说《仰角》，到21世纪初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四面八方》《高地》等，无论是书写军旅现实的悲喜人生，还是建构战争历史的英雄传奇，他的小说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好看”。之所以“好看”，一个直接原因就在于“像”。无论情节多么跌宕传奇，人物多么个性乖张，小说的“物质”层面都是颇为扎实的。

以作家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史料为支撑，《历史的天空》以降，徐贵祥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伦理持续深耕，又接连出版了《明天战争》《特务连》《马上天下》《对岸》等多部长篇小说。尽管题材各异，但整体上仍可概括为“性格英雄”加“历史传奇”的写作范式，直到这部最新长篇小说《英雄山》。徐贵祥笔下的故事已经不止于“好看”了，枝节繁复、悬念丛

场重新反思、阐释和建构错综复杂的历史，历史的可能性和人的存在感都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释放。这种新鲜的文学面相，是否表征着进入2020年代的军旅小说会延伸出新的文学可能性，也未可知。

二

《英雄山》的特别之处在于，悬疑的情节、极端的处境、镜象的命运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赋予读者极致的代入感、参与感。历史不再被局限于彼时彼地的特定时空，而成为一种可以通约和共享的情境。小说中的人物游走于这种亦真亦幻的情境中，即便沾染了某种“二次元”的特征。如同漫画和游戏世界中的人物一样，在通关练级、加血续命的逻辑链之下，人物得以在不同的肉身和角色间跳跃，打通曾经被区隔在决然对立世界中的生命经验和思想意识，这是此前阅读传统军旅小说无法得到的快感，甚至可以说是“爽感”。这让我想起了网络文学中的玄幻小说，那种思想内容幽深玄妙、故事情节奇崛瑰丽、经验逻辑不受科学与时空的限制、格调励志热血，可以让作者和读者共同自由发挥想象力的文学类型。当小说主人公以几乎“不死之身”最终“闯关”成功，完成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传奇也便多了几分玄幻的味道。

曲线救国，凌云峰化身楚大楚；借尸还魂，易水寒顶替凌云峰；洗心革面，何子非成为战术之神；脱胎换骨，张达理变身妙手神医。人生的穿插、命运的反转，凸显了战争叙事中极端经验的魅力。《英雄山》对战争历史的虚构不再单纯强调“逼真”的幻觉和认知的功能，而人的命运和生命存在的诸种可能性被高度正视和尊重，进而生成另一种历史的意义。

战争历史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光滑如镜的，实则是乱世求生、紊乱繁复的欲望之海。我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奔流到海的大河，而选择性地忽视了如毛细血管般从各个来路汇入大河的支流，人心和人性永远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那汹涌起伏的暗流。凌云峰、何子非、易水寒、楚大楚、谢谷、蔺紫雨、陈达等主要人物，都承受着身份、心理、人格等多重分裂，都有着复杂的前史和难言的秘密。徐贵祥亲历过战争，以“穿插”和“伏击”这两个军语作为小说题目，亦表露出他对历史乖谬、人性异化的洞察。

三

近年来的军旅小说中，职业军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形象越来越多。不仅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中人物身份的设定也出现了雅化、知识分子化的趋势，这与21世纪初流行开来的那波以“农民军人”“大老粗”“匪气英雄”为主体的俗化浪潮形成了鲜明对照。《英雄山》也是如此。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可以说都是受过正规教育

的。如此集中地大规模书写知识分子，无疑是战争叙事的一种新的趋向。

上部《穿插》一开篇就显得很另类。“我”(凌云峰)是红军团的侦察参谋，带队来到其中坪，执行一项“莫名其妙”的任务。由于战友们的鲁莽，他们遭遇马蜂攻击，凌云峰运用专业知识化解了危机，并给启明、安屏等女性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中坪这块世外桃源般的政治飞地，凌云峰和安南先生、理查德神父、外国美术教师李海伦谈论关于宗教、政治、信仰、红军的话题，即便作家尽可能让人物的言说不超越自己的身份、视角、经验和知识储备，但是这种开篇的情节设置还是显露出与徐贵祥此前作品迥然相异的段落。

小说中有很多描写日常生活的段落，甚至还有许多似与残酷战争环境不符的、扎眼的浪漫情节。凌云峰和启明、安屏的邂逅，便流露出浓重的浪漫气息，而与谢谷的遭遇则更甚之。生死之战的前夜，两人居然去观雪台上边仰望星空边聊天抒怀。谢谷这个看似文质彬彬的国民党军官，竟然与萍水相逢的红军军官一起眺望牛郎和织女星，还附庸风雅地吟诵唐诗。而“去年今日此门中”作为暗语和密码在后面的故事中还会反复出现。

敌对双方的军官在彼此并不托底的情形下，竟能如此浪漫、知性地对话，所流露出的生活情趣、思维方式显出小说不同寻常的高度雅化的趣味和格调。临别前，安屏有些突兀地分别送给凌云峰和谢谷一个桃木匣子作为礼物，说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以后才能打开。结果匣子意外丢失，留下一个多年未解之谜。而对于鹰嘴岩伏击这场铺垫已久的战斗，徐贵祥的描写反而非常简单。概而言之，“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结果，凌云峰受了重伤。“你不用担心，我没有死掉。”从一开始，凌云峰几乎就是不死之身。他被送进教会抢救，做手术的是法国医生，虽然胸前中枪，但也活了过来。此后，小说故事更加离奇，人物宛若开挂，每次命运的反转都似一次新生，人物随之实现成长。

四

《英雄山》中的人物实在太多了。读罢掩卷，仅仅是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的人物就有，谢谷、蔺紫雨、蓝旗、巴根、乔东山、楚大楚、陈达、凌云峰、安南先生、安屏、易水寒、郭涵、贺之发、苏佐、文中文、赵钰、杨焕、权苏正、桑叶、张达理、江浦、王铁索、张秋生、杜何等等。随着故事推进，新人物层出不穷，每个人物的形象、立场、思想、性格甚至是举止动作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这对作家而言是很难写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也要为徐贵祥漫漶的叙事风格所苦，因为故事情节异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有点烧脑，再加上叙事视角和时空的转换，插叙、补叙、倒叙等技巧的运用不一而足。上下部、双文



徐贵祥

本的叙事策略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有时需要互相对照，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故事的脉络。

小说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前史和故事，也都有自己的心事和秘密，甚至还有自己的特长和绝活。蓝旗是个戏子，还有一手扒窃的绝技；张寡妇擅长做饭，拿手菜是辣子鸡；陈达既是情报头子，对战术也有着深入研究；何子非是工程师、架桥专家，被俘虏后他也被成功地改造了过来，最终成为战术之神般的人物。爱吃辣子鸡是他的嗜好，但更像是一种标签或者符号，以此确证日常生活经验和肉身感官存在的意义。但是后来这种权利被剥夺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自我的阉割。因为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做饭的人还是吃饭的人，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或许是因为小说人物实在太多，故事变得庞大芜杂，结构也十分复杂，情节间存有大量的裂隙，缺少生活细节的充分填充，也缺少特定年代的历史信息。比如，结尾处反复提到的“剥皮战”含义是什么？具体过程是怎样的？都没有展开。类似的仓促和粗糙的段落在整个小说中还有不少，某时某地，故事的增殖和延展尚欠缺逻辑必然性的有力支撑，人物的情感线索也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深化。给我的感觉是，疲于奔命地跑故事，交代性的语言也嫌过多。

五

徐贵祥将个人经验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动荡交织缠绕，使读者感到历史既是由人对外在世界变化的自发反应而展开的，又是在一连串重大、公开的事件中呈现出来的。于是乎，《英雄山》也便具有了双重视角：一方面是力抗历史洪流的心灵，是觉醒的自由人在不断追寻未知的未来；另一方面又是命运之神所掌控的玩偶。历史或许是一股洪流，每一个人的命运不由自主地落入其中。《英雄山》中，主人公易水寒怀揣着原本坚定的理想和誓言，冒名顶替，混入红军队伍，时刻准备杀

身成仁，最后却假戏真做，与对手凌云峰融为一体，这种桥段简直比好莱坞大片《夺面双雄》还要传奇甚至离奇。若按照一般的经验、情理和逻辑推演，这显得太过机巧，至多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而徐贵祥想要探寻的正是这种历史的可能，不仅要内在价值和身份的层面实现“穿插”，更要在生命价值和自我意识的深层次完成这种灵魂的互见和转化。

个人的最终命运是英雄还是叛徒，始终晦暗不明、纠缠不清地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贯穿小说始终。“英雄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隐喻，托举护佑着“民族国家”的存在，但历史的星空却是由一个个生命个体点亮的。小说中，“个人”被从历史中拯救、解放出来，个体上升为主体，成为叙事的人，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现代性”不是一个肯定的概念，但也不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它是一个反思的概念。”(李杨语)事实上，无论是穿插还是伏击，所谓的战术胜利终究是精神的胜利，而政治的、阶级的、党派的差别和裂隙最终被精神、灵魂、理想、信仰的意义所消融、弥合。对精神的执着追寻和反思是以肉身的受难和苦行为代价的。小说主人公一次次遭遇命运的暴击，时时承受着肉身的伤痛、意外的考验、反思的煎熬、精神的折磨，人在战争中的状态更像是经历苦行的历练。

《英雄山》中，主人公所遭受的炼狱般的折磨和考验恰恰成了精神接受洗礼和升华的必要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贵祥笔下的“传奇英雄”最终升级为“超级英雄”，跳脱生死，跨越党派，超越阶级，突破了二元对立的历史定见，达成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对战争历史的反思与重构。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研究

徐贵祥(1959~)，祖籍安徽长丰。1978年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8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等。著有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仰角》等。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获人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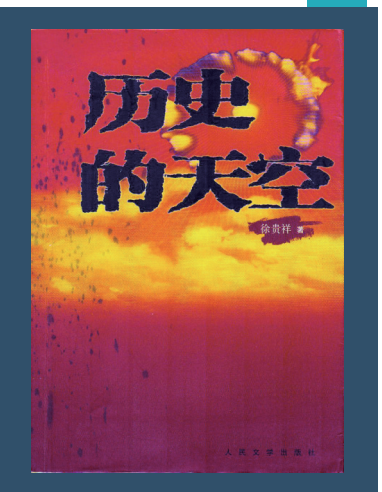
生、人物众多、时空穿越跳荡、情节迂回反转，阅读过程中会生出脑洞大开甚至是“不可理喻”之感。即便如此，对照着读完上下两部——上部《穿插》(《中国作家》2019年8期)、下部《伏击》(《当代》2020年1期)，会发现小说的故事仍然是闭合的，逻辑是自洽的，悬念亦是落地的，承载叙事功能的道具在后文都得到呼应，人物的命运也都有所交代，徐贵祥编织故事的功夫确实了得。

然而在我看来，小说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还是在眼花缭乱的故事之下，涌动着“现代性”写作伦理和文学趣味的新变。沉潜了数年之后，徐贵祥对于军旅文学、对于战争历史的理解和掘进显露出了新的气象。他试图超越线性的历史观，让我双方的主人公在极端情境和高度戏剧性的冲突中经受肉体、身份、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思想精神的互见与试炼，以“现代性”的观念和视角重构英雄传奇。小写历史、个人记忆、多重视角、玄幻高蹈的灵魂叙事、酷烈幽微的心理描写，无不承载着作家对战争、对历史、对人的省察与思辨。历史本身的“实感”不再是叙事的重点，意识形态的藩篱也是需要突破和重新审视的对象，以“现代性”的、个人化的立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儿时读唐诗，囫圇吞枣，不求甚解，常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比如说，永远分不清李太白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和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稍稍长大些，在课堂上与这两首诗重逢，才发现，当年的苦闷并非我一人独享，“少年不识愁滋味”，多年后才明白，《渡荆门送别》是李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所作，而写作《旅夜抒怀》时的杜甫已经垂垂老矣，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刚刚二十出头的蜀中才子满怀理想踌躇满志的心态与阅尽世态炎凉、“官应老病休”的少陵野老自然有着天壤之别，微言大义都埋伏在字里行间。

年轻人大多热爱李白的“逸兴”和“壮思”，而对杜甫的愁和苦不以为然，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身为“互联网一代”的“90后”“00后”们，恰好于那种“风歌笑孔丘”的年少轻狂心有戚戚焉；也正因此，他们才会热衷于在“B站”和社交媒体上谈论那部长篇“霸占”各大卫视“暑期档”的《亮剑》，而对几乎与此同时问世的《历史的天空》(以下简称《天空》)不甚感兴趣，哪怕是剧版《天空》和它的原著小说在2005年同时拿到了国内各自领域的最高奖“飞天奖”和“茅盾文学奖”。

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在影视界，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徐贵祥的《天空》和梁

宋嵩

斜月沉沉藏海雾 碣石潇湘无限路——理解《历史的天空》的当下境遇

的《亮剑》并举。作为长篇小说，两部作品均初版于2000年；而作为由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天空》(2004)和《亮剑》(2005)也似孪生兄弟，一前一后接踵而来；再加上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乃至细节上都有颇多相似之处，问世之初均曾在读者和观众中引发巨大反响。回望世纪之交的最初10年，类似的文学(文艺)作品喷涌而出，除上述最具代表性的两部，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的还有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石钟山的《父亲是个兵》《父亲进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原著)等，这些被冠以“新军旅小说”或“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名号，进而随着大规模的影视化浪潮而为人人所熟知的大作，成为彼时文艺领域现象级的存在，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其标志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飞天奖、金鹰奖等国家级文艺奖项的授予。与其后10年泛滥于“抗战神剧”中的“戏说”等“娱乐化”创作倾向不同，徐贵祥、邓一光等作家秉持着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历史主义”思潮洗礼之后，他们对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对时代社会语境、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都有了崭新而深刻的认识。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及世纪之交外方、军事等领域重大事件的发生，他们试图在新形势下通过文学艺术重构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重新整合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重建革命历史叙事、重塑充盈着“男性气质”的战争英雄形象。一

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政治策略：创造一套定期重演，以实现国家初创时期的‘创伤情境’的民族叙事，以便使国家回到一个特殊的时刻(刚刚建立自己的国家)，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关头。它不仅是一种‘再确认’，而且是在不断地重述中重返那一刻，藉此来定期地重新召唤国家初创时期的那股力量。”(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另一方面，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对“阶级苦”“血泪仇”的极端强调大相径庭，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无不富有“人性”和“人情味”，“阶级仇恨”让位于“民族大义”和“儿女深情”，且处处以令人读来血脉偾张的行为(不只在战场上，也体现于日常生活中)彰显战争年代男性荷尔蒙的弥漫。于是，梁山牙(《天空》)、李云龙(《亮剑》)、关山月(《我是太阳》)等迥异于传统革命英雄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他们继承了《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革命历史小说中主人公的豪迈性格，但更为恣肆放纵，甚至表现出以往罕见的野性或匪气，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草莽英雄”；那些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所极力摒除的性格因素，此时却被作为一种“新质”而大肆张扬。

于是，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满嘴粗话、意气用事、好斗恋战且不乏农民式的狡黠的英雄形象，曾经作为英雄“标配”的光环消失了，甚至连之前反复强调的远大思想抱负、坚定政治立场、严密的组织纪律性都有退居背景格次要因素

的可能。他们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平凡”，只不过在特殊的时代境遇下，每个“凡人”潜意识中的某些人格因素得以彰显。正如邓一光所说，他就喜欢“男人”这个词表现的那些人格内容，勇敢、顽强、坚毅、韧性、侠义、大度、刚正、力量、智慧、宽容、风度、自信、自持、自尊、责任感、道义感、荣誉感等；同样，徐贵祥也强调，他写战争是为了写人，写中国人，中国男人，写压不倒、拖不垮、砸不烂、毁不灭的，有血性、有责任的中国人男人，“这是一种英雄情结”。我就是想写出这样的一群。也因此，当这些人格因素与“快意恩仇”“个人奋斗”结合在一起，伴随着梁山牙从一个误打误撞进入革命军队的门店小伙计一步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就更具有了引导人生的意义与寄托。在《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身上，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些人格因素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桀骜不驯和宁折不弯的性格特征贯穿了他人生的始终，自参加红四方面军和长征时代起，“对政治毫无兴趣”和“擅做离经叛道之事”就一直是他性格中最醒目的标志、立功功之、降职亦由之，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能够坚持几十年一以贯之。观其一生所作所为，乃是明人李贽所言“童心”的集中体现：“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心也。”不失童心，乃得真心；得到真心，便成真人。2005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25届“飞天奖”的评奖结果，既是对《天空》这一特定作品的褒奖，更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此前十余年间以《天空》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叙事”的

充分肯定。然而之后，随着青年一代逐渐接过社会历史的接力棒，《天空》和《亮剑》两部作品的当下境遇却发生了微妙变化，其原因可以从作品本身的特质、读者/观众的接受心理两方面去综合探究。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亮剑》及其主人公李云龙身上体现了李太白及其诗作的气质，那么，《天空》和梁山牙(电视剧中改名为“姜大牙”)则多多少少带有杜工部诗的味道。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人物个性的塑造、情节曲折的程度方面，两部作品各有所长，两位作者甚至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似的细节来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丰满感人。但同时，两部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亮剑》中的李云龙对政治“毫无兴趣”，而《天空》却始终都将政治斗争作为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加以体现。这些“斗争”既有发生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也包括国民党军内部，以及发生在两党两军之间的。从小说开头梁山牙、朱一刀欲投国军却“误入”我军开始，读者便能嗅出政治斗争的“火药味”：杨庭辉认为“梁山牙先生同情革命，有正义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而一贯坚持原则、以“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张景凯却“打从见到梁山牙那天起，就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同志”，认为“就算他参加八路了，也是一个投机分子”，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也没有“革命的理想”。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看法或许并不少见。于是，在《天空》的开头，我们体会到的不是李云龙式的杀敌“快感”，而是一种政治观念 and 路线方针上的对立，随着情节的推进又发展成为派系斗争的阴暗。张

普景对“原则”的固执和坚守，屡屡被怀有强烈权力欲和报复心理的江古碑、李文彬所利用，更何况还有一个先后经历过几次“运动”、差点被对手清洗掉而信奉明哲保身、深藏不露的窦玉泉在骑墙观望。反观梁山牙，亦绝非李云龙式的“不问政治”，而是在与张、李、万的数次交锋后明确了一条原则，那就是他在经受了凹凸山地区“纯洁运动”的折磨后对东方闻音所说的：“革命二字，没有那么简单。……革命就是斗争，同鬼子斗，同奸奸斗，也同内部的坏人斗。……我要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策略的革命者，找准斗争对象，把握斗争策略，选准斗争目标。”这样的感悟和表达是惊人的，断不会出现于李云龙口中。而事实上，梁山牙的抉择和成长才最符合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真相；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顿挫老成、工于心计、勇于斗争，反映着历史与现实中的悲凉感和沧桑感。可以说，李云龙的一生似李白，浪漫情怀无尽；而梁山牙的一生则似杜甫，是20世纪中国沉郁历史的写照。对于年青一代而言，自然易在心理上更亲近《亮剑》和李云龙，而主动与梁山牙保持距离。

然而，年轻人终究有长大的一天。是否也只有当一个人的人生阅历丰富了，才能够分辨出“山随平野尽”和“月涌大江流”背后的微言大义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是唐人，同是月夜，《春江花月夜》(张若虚)里说得好：“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天空》与《亮剑》、梁山牙与李云龙之间的距离，或许就像斜月映照下的“碣石”与“潇湘”那么远吧。